

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本辑编辑小组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显恩、李龙潜、黄启臣、蒋祖缘、谭棟华

本辑主编：

叶显恩、蒋祖缘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 编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 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58,000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80册

书号 4111·202 定价 3.45 元

序 言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北枕南岭，系中国历史上的越人故地。隋唐之前，地广人稀，“蝮蛇蠹生，病疠多作”（《汉书·严助传》），人皆“半羸”，“生齿不蕃”（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经济发展水平远比中原落后，刀耕火种，火耕水耨。以“饭稻羹鱼”自足，顺乎自然，对环境没有作能动的改造。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广东简直是一派可怖的化外生蕃景象。

在从中唐始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的总趋势影响下，宋元时期，广东进入了初步的开发期。明清两代，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明初重开会通河，大运河得以畅通；加之整顿大庾岭山路，沿赣州南下越大庾岭到两广的商路益加便畅，南北贸易更为频繁。海外贸易隆庆之后又有较大的增进。秦汉以来就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的广州，从晋代南朝起，其地位尤显重要。明廷在嘉靖元年（1522年）“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清廷也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江、闽、浙三关。唯有广州未曾闭关，且于关闭他关之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本是僻处海滨的广东也一变成为与海外往来的便捷之区，处于浸染近代文明、得近代风气之先的地理位置。作为广东的经济核心区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从以经营水稻为主的比较

单一的作物逐渐改为种植品种繁多的商品性农作物，形成多种农作物组合型的农业结构，因而也就成为海内外商品生产的基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利用自然界和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规律，创造了所谓“塘以养鱼，基以树桑”的桑基鱼塘的经营方式，桑叶饲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循环利用，互相促进。这一独特的多种经营方式，把我国的传统农业推向空前水平。广东其他地区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素称落后的广东，一跃而进入国内先进经济区域的行列。应当指出，广东之所以能后来居上，除其本身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海外贸易的发达相促进而引起的社会内部生产关系的一些变化等条件外，海外华侨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广东作为开发较晚而发展迅速的经济区域，今天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之一，而且在全国占据的战略地位愈来愈显重要。鉴古可以知今，懂得历史的源流，方可了解历史发展的趋向。明清两代是广东进入全面迅速开发的历史时期，也是社会经济后来居上的演进时期。对广东这一时期社会经济作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探索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规律，而且还可以为当前我国利用广东的特殊地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办好特区，提供历史的借鉴。所以，它无疑是一项富有现实意义的科学研究课题。

需要顺带指出的是，中国自周秦以来，在统一的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未曾间断，彼此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在古代商品交换有限，地方闭塞，各地区历史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因此，往往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所以，在作全

国综合性研究的同时，需要作局部地区的典型解剖，或作地区的比较研究，以展示历史发展的多采多姿的风貌。全国性的综合研究，自当以各地区的研究为基础。同样，地区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狭窄的小天地，而必须放眼于全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把个别的局部的历史无限推衍，描绘成普遍性的历史，其荒谬是不言而喻的，但离开中国历史的整体，囿于一隅之见，孤立研究地方史，无疑也不可能揭示历史的真貌。区域性的研究和全国综合性的研究，当应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我们正是抱着这一宗旨进行广东地方经济史的研究的。

我们还感到，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记载纷繁，详略不同，真假混淆，加之古今异词，雅俗异称，考诸载籍，每识一而昧二。难怪司马迁撰史记也采彼家人，孔安国述春秋也访诸故老。因此，广辟资料来源，发掘原不被重视的民间契约文书、帐簿、函札等，加强实地考察，博访周咨，穷搜口碑传说资料，以助见闻，并且注意把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引入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对此，我们尚缺乏经验，但愿在这方面也作出我们的努力。

一九八三年春，我们就明清广东社会经济问题，召开了首次学术讨论会。会后由蒋祖缘、李龙潜、黄启臣等同志将提交会议的论文选编成《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一书。此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尔后，承蒙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这一研究课题列入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历史学科重点项目，并给以经费资助。为了检阅一九八三年春以来关于这一研究项目的成果，并推动其深入研究，又于一九八四年六月底在肇庆召开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广州地区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的史学工作

者，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广东省、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县档案馆、博物馆的代表。本辑主要就是从提交这一会议的论文中选编而成。书名易为《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本辑刊出的十五篇文章中，从商业与市镇、农田水利与农业生态、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图甲制与土地占有制、宗法制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在商业与圩市方面，蒋祖缘的《清代佛山的商业和商人》一文，对清代佛山的商业发展过程作了考察，指出其繁荣始自康熙中期，乾、道年间（鸦片战争前）趋向鼎盛。佛山商业之所以较长时间内繁盛不衰，是由于安定的社会环境，珠江三角洲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佛山手工业的发达及其内部圩市所起的辅助作用，因河道疏浚与增辟道路而带来的交通顺畅，海外贸易的发展及大量吸引外地资金建置商场等原因。本文还对佛山商人的构成、经营思想和手段、利润的流向等方面作了探讨，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例如作者指出，“清代佛山商人主要的已不是注意囤积居奇，贱买贵卖”，而是通过恪守商规、注重建立信誉，增加贸易额来赚取利润。“因为在商品多，流通较快的条件下，只有取得顾客的信任，……生意兴旺，转手快，自然获利也就更多”。黄建新、罗一星的《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文，根据方志、族谱、碑刻、铭文等丰富的文献、文物资料，探讨了明清佛山镇兴起的原因，论述了佛山镇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作者认为，佛山镇是为适应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在佛山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若干特点，表明了佛山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由于佛山既是岭南最大的手工业基地，又是岭南重要的商业（内贸）中心，因此它的存在与发

展，对珠江三角洲，乃至岭南的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叶显恩、谭棣华的《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一文，则就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商业化与圩市的繁荣作了叙述与分析，力图说明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农村圩市的发展变化及其所起的作用。

在农田水利与农业生态方面，李龙潜的《明清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一文，对农田水利发展的概况、意义及其局限性作了探索。指出“利用陂塘蓄水，灌溉农田的方法，因地势不同而异。低洼农田，采取开圳或窰闸引水解决”，“高亢山地，低水高送，则设陂于傍河地带，利用水车引水来解决”，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巧思和智慧。堤围、陂塘工程的兴建与维修，用水管理等，都建立了一整套的制度，并日臻完善。修筑的技术，灌溉提水工具和水力机械的应用和推广，也获得了提高。农田水利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广东进入了全面开发的新时期”。但由于农田水利的兴修，“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支配和操纵”，其发展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速度也是缓慢的。谢天祯的《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态与农业经济》一文，对珠江三角洲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一些农业生产经验，作了初步的总结。指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之所以于明中叶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一跃而进入全国先进经济发展区域的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的农业生产注重生态平衡，即因地制宜，农牧副渔全面发展；掌握季节，不失时机地安排农业生产；种桑养鱼，进行基塘式的循环经营；轮作施肥，注重养地用地的原则。他着重从生产力的角度对明清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作了探讨。尽管还仅仅是初步的看法，也已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不能离开生产力来研究经济史。将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结合起来考察不失为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一种方法，亦即把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个社会着眼研究经济史，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史，就有可能再现社会经济史本来所具有的色彩斑斓的丰姿。

在财政赋税金融方面，刘志伟的《明代一条鞭法改革之前广东地区赋役制度考述》一文，就赋役的项目、演变趋势、改折为银征收的经过、征收中的流弊等作了考察。作者是一位对广东的赋役制度研究下了工夫的年轻学者。文中运用的史料较为丰富，对一些问题既有微观的论述分析，也不乏宏观的概括。作者在文中指出，在一条鞭法实施之前，广东地区赋役折银已相当普遍，“田赋和杂赋已经基本上用银缴纳，相当大一部分差役以纳银的方式取代了躬身应役。这是明代广东赋役制度发生变化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同当时广东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明货币赋税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和规模的结果”。这些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叶显恩、谭棣华的《略论明清珠江三角洲的高利贷资本》一文，就高利贷资本的形式、来源、发达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了探讨。作者指出，近代银行出现之前，典当质押等形式的高利贷组织是明清时期的金融组织之一。“由于高利贷本身的封建性，它既不象商业资本那样可以促进商品的流通，又不能象近代银行资本那样帮助工业资本家发展生产。在明清的历史上，它所起的作用几乎都是消极的。唯有到旧的生产方式解体，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之时，它才可以促进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起到进步的作用。在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下，如果说也曾起过某些作用的话，也是十分有限的”。陈春声的《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这篇文章指出，“咸丰

以后清朝金融制度多次陷于危机之中，而广东的货币流通却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局面，这与其银元的广泛使用必然也有一定联系。鸦片战争前外国银元的大量进口还导致了乾隆、嘉庆年间和道光前期中国物价的稳步上涨。在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作者是刚得硕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努力把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①，注意广辟资料来源，发掘民间的账簿、契约等文书材料。

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专文分别就外贸的管理机构粤海关、广州的外港、国际性的贸易港口澳门作了研究。黄启臣、邓开颂的《略论粤海关的若干特殊制度及其影响》一文，就粤海关所建立的区别于其他海关的行商制度及减税通商制度作了论述。作者认为行商制度的建立，旨在管理对外贸易，以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以及保证征收关税的便利。实行减税通商制度则为了招徕贸易。自从设立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以后的一百七十多年中，曾对来华贸易的外商的某些活动有严格限制（这是必要的），但并非与外国完全断绝商业贸易（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通过递减关税给外商以种种优惠。因此，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在发展。作者还对两项特殊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作了分析，指出它“使鸦片战争前中国以广州为出口的对外贸易渐趋繁荣，而且一直是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余思伟的《论澳门国际贸易港的兴起、早期发展及明王朝的管

^①作者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实践体会，撰写了《浅议统计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一文（刊于《学术研究》1985年第3期），对与计量分析密切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提出了看法。这对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无疑是一有益的尝试。但愿这一尝试能得到史学界的重视。

辖》一文，先从商业的角度对澳门兴起的历史条件作了考察，指出“澳门港是在早期西方殖民者破坏正常的‘朝贡’贸易之后产生的。广州贡舶贸易的衰落直接导致了澳门港的兴起，促进澳门港形成的不是葡萄牙殖民者，而是东南亚各国商人。”继而将澳门早期的贸易分为从嘉靖十四年至万历初年和从万历初年至明末两个时期来加以论述。最后就明王朝对澳门行使主权，严加防范和管辖的情况作了探讨。黄启臣、邓开颂的《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文，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起和繁盛，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的问题，已愈来愈引起国际上人文学者的关注。依笔者所知，美国圣·路易斯大学谢文逊教授等已成立珠江三角洲研究小组。谢文逊教授本人多年来致力于顺德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成露西教授领导的广东华侨史（包括侨乡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她的合作者之一苏耀昌博士（今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已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清代广东顺德蚕丝业方面的著作。另一合作者穆素洁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广东的蔗糖业为题。其他如耶鲁大学的肖凤霞副教授也正从事广东圩镇企业的研究。加拿大卑诗大学的魏安国、詹逊教授等，以及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森田明、松田吉郎、今堀诚二、扶马进、西川喜久子、片山刚、林和生等等，都已经发表了他们关于广东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见国外的学者对广东社会经济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展示着令人兴奋的前景。

学术研究的成果，应当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应该划分国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各地区间的交往、联系，

日趋频繁和便捷。加强与国际上同行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无疑将有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闭关自守、闭门造车，把自己的研究置于时代的学术潮流之外，显然是可悲的。为了交流研究成果，互通信息，本辑选刊了魏安国博士关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占有、赋税和宗法制的论文及片山刚副教授关于清末珠江三角洲图甲制的论文。魏安国教授对珠江三角洲、徽州、台湾等地的土地制度研究有年，曾不辞劳苦，多次风尘仆仆到实地作考察。他的论文，着重探讨了“一田两主”制。土地关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一田两主”制，反映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内部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的分离。它增强了佃农经济的独立性，使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速度及其特点的理解，甚至还可以进而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经济的结构、特点及其发展道路。因此，国内外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对此给予关注。魏文就中国、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罗列论据，但依我看来，每一论点都是有史料作基础的，并非泛泛之谈。作者提出“一田两主”制的流行，同商业化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现金的追求，宗族势力发展及宗族土地所有制，人口压力，土地垦辟，赋役制度等因素都有连系。惜限于篇幅，有的问题作者没有展开并加以论证。作者在本辑刊出的这篇论文，还对片山刚关于图甲制的文章作了评述。片山刚对珠江三角洲图甲制的研究很有独到见解，在一系列的论文中提出，在图甲制中总户、子户是指一个宗族或一个支派的课税单位，总户已成为制度化的赋税催征者，总户名称可历数百年而不变；个体的小土地所有者

是作为子户之下的丁而存在的；总户向子户、丁催征钱粮，并负责向官府交纳；没有设总户的宗族便作为子户附属于拥有总户的同族之下；土地的转移只向宗族报告取得确认即可，不必向官府缴纳税契银，办理过割手续，等等。这些看法，尽管正如魏安国教授所指出的是否完全适用于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尚待进一步考察，历史的实际情况比片山刚文中所谈的要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是很有见地的。同时应当指出，片山刚所提出的问题，未必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仅有。河北获鹿县在清代就存在编审册上的户系指一宗族或一支派的情况^①。所以，片山刚的论文对明清里甲制、赋役制和宗法制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相信读者当能从他的文章得到某些启迪。

本辑在选编过程中，承蒙广东省历史学会李鸿生同志给予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① 详见潘喆、唐世儒《获鹿县编审册初步研究》，载《清史研究集》第3辑。

目 录

序言	叶显恩 (1)
清代佛山的商业和商人	蒋祖缘 (1)
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	黄建新 罗一星 (26)
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圩市的发展	叶显恩 谭棣华 (57)
明清时期广东的农田水利事业	李龙潜 (98)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态与农业经济	谢天祯 (120)
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广东地区赋役制度考述	刘志伟 (138)
略论明清珠江三角洲的高利贷资本	叶显恩 谭棣华 (176)
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	陈春声 (206)
略论粤海关的若干特殊制度及其影响	黄启臣 邓开颂 (237)
论澳门国际贸易港的兴起、早期发展及明王朝的管辖	余思伟 (259)

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

..... 黄启臣 邓开颂 (280)

明代广东的盐户..... 冯志强 (300)

清代前中期广东榷盐的两个问题..... 龚红月 (312)

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宗族、赋税和土地占有

..... [加] 魏安国 (329)

清末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图甲制的矛盾

及其改革(南海县)..... [日] 片山刚 (341)

——税粮、户籍、宗族

清代佛山的商业和商人

广东南海县佛山镇是从宋代开始，逐渐由乡村圩市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市镇。明朝景泰年间，这里已是四远商贩辐辏，到清代前期发展成“岭南一大都会”。时人既把佛山誉为四大名镇之一，又将它与京师、苏州、汉口并列，称之为“天下四大聚”^①。它在清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只就清代（鸦片战争前）佛山的商业和商人作一专门探讨，以就正于同志们。

康熙二十三年《修灵应祠记》说：佛山“距会城五十里，为上游地。连乡接畛，沃野四达，漓郁之所经于其北，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河面广踰十寻，而舸舶之停泊者，鳞砌而蚁附。……沿岸而上，屋宇森复，弥望莫极。其中若纵若

^①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

横，为衢为衍，几以千数。阡陌层列，百货山积。……往来络绎，骈踵摩肩……。”把佛山镇的轮廓大略勾画出来了。

明景泰年间，佛山是“几万余家”^①，到清乾隆年间增加到三万余家^②。市区也由明朝的二十四铺发展到清道光年间的二十七铺。棋布星罗的大街小巷六百余条，其中以工商命名的就有一百多条。这除了以冶铁为特征的诸如铸砧街、铸犁大街、铁矢街之外，还有旧槟榔街、豆豉巷、白米街、盐仓巷、咸鱼街、虾鱼巷、鸡蛋地、藕栏、蚬栏、牛乳巷、豆腐巷、面粉巷、皮箱街、绒线街、金线街、线香街、饼料街、京果街、果栏街、珠玉巷、烟皮巷、钟巷、布巷、花衫街、纸盒街、杉街、柴栏、卖箩巷，等等。这些朴素的街巷名称不仅反映出佛山商业的发达，而且标志着佛山由乡村圩市发展为工商大都会所走过的道路。

佛山并不以商业为主，而是工商业都很发达的市镇，所以，商业区域与手工业区域交错在一起。但到清代中期，两者毕竟各有侧重，逐渐形成以汾水、潘涌、富民、鹤园四铺为主的商业中心区域，尤其是汾水旧槟榔街最为繁荣与热闹，这里的“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③，特别引人注目。

佛山的“行店多至二百余家”^④，而每一行店又有许多家店号。就商业的行店来说，经营着各种各样的商品，主要的有铁器、铜器、锡器、银器、瓷器、缸瓦、布匹、绸缎、棉花、青麻、青靛、西货、海味、京果、油、豆、粮食、酱料、盐、

①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但《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说是“凡三千余家”。待考。

②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3。

③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农商类。

④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